

Shanghai
FORUM
上海论坛

上海论坛论文与演讲精选集

中国发展与亚洲的未来

袁堂军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013044165



Shanghai
FORUM
上海论坛

上海论坛论文与演

编委会主任：杨玉良、朱

丛书主编：林尚立

D73-53

03

中国发展与亚洲的未来

袁堂军 主编



北航

C1647021

D73-53

03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发展与亚洲的未来/袁堂军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5
ISBN 978-7-309-09686-6

I. 中… II. 袁… III. 亚洲-研究-文集 IV. D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3079 号

中国发展与亚洲的未来

袁堂军 主编

策划编辑/马晓俊

责任编辑/马晓俊 庄彩云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1 字数 171 千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686-6/D·620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航

C1647021

“上海论坛论文精选集”编委会

主 任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朱之文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丛书主编

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

委 员

(以姓氏字母为序)

陈建民 陈诗一 陈寅章 华 民

姜义华 金光耀 金 泽 康泰硕

李维森 陆雄文 彭希哲 任 远

苏长和 孙立坚 孙笑侠 吴力波

吴心伯 袁志刚 张 军 张 怡

序 言

Preface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亚洲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区域。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亚洲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经由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这两个途径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也越大。我们可以看到 2008 年的危机对亚洲金融体系的冲击表现得较为轻微,而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较大。后者不仅反映在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减少,而且影响到域内实体经济的生产。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形成与深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亚洲,基于生产环节的分工日趋细分化,为追求生产成本的最小化,跨国企业针对每一生产环节,尽可能地选择立地条件最合适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而伴随这种生产过程碎片化的深化,区域外对亚洲生产的最终品的需求增加,并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内中间品、零部件贸易扩大。毫无疑问,出口增长拉动了亚洲经济的增长。然而,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使得亚洲经济这种外需依存体制的脆弱性凸显无遗。危机发生后,亚洲各国,特别是中日韩都出现了比预期更为厉害的出口萎缩,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凯恩斯经济学假说。

亚洲区域内所形成的多层次生产网络是亚洲竞争力的源泉所在,而基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是推动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力,这也决定了亚洲各国出口导向的基本模式不会轻易改变。但要实现可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关键是如何调整现行增长方式,减少对欧美诸国市场的依赖,形成能够抵抗外部冲击的经济结构。这要求我们对现行的亚洲发展模式所面临的问题有准确的判

中国发展与亚洲的未来

断和认识,尽可能地从亚洲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关联以及从短期和中长期的角度厘清亚洲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从亚洲与国际经济关联的角度,首先从短期来看,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持续低迷。尽管最近对欧洲和美国的经济预测报告显示出经济缓慢复苏的基调,但信贷紧缩、就业恶化等阻碍复苏的因素依然存在,因此,欧美诸国的经济要全面复苏到危机前的状态,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如果现行的发展模式不能及时调整,那么从贸易的渠道对亚洲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会日趋明显,外需依存的经济结构亟待突破。另一方面,虽然亚洲克服了1997年的通货膨胀危机,但整体的金融体系仍然相当脆弱。此次得益于所持有证券化商品相对较少,而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有限。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危机后遗症的蔓延,一旦欧美诸国的金融调整陷入长期化,那么全球金融市场将再次陷入不稳定,这很可能导致外国资本从亚洲撤离,亚洲各国不得不面对外汇储备减少、货币和股市暴跌的风险。

其次,从中长期来看,亚洲面临全球经常账户失衡中暗藏的风险。特别是如果过度失衡是资产泡沫等非效率投资所引起的,就更应警惕。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住房投资。我们看到,虽然危机后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一度出现缩小,但随后很快再次显示出扩大的迹象。如果美国维持目前的财政赤字水平,经常账户失衡继续加剧,势必引起投资者对美国财政产生疑虑,导致流入美国的资本减少(或者资本流出),美国经济很可能因美元和股市的暴跌而失速,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硬着陆。虽然此次资金没有从美国逃离到欧洲等地,而是转向了相对安全的美国国债,才得以回避硬着陆,但只要导致失衡的因素继续存在,中长期美元贬值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亚洲因拥有庞大的以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而不得不承担巨大的资本损失。

毫无疑问,未来的亚洲将会继续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而融入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因此无论从贸易通道还是金融渠道,亚洲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外来冲击。出口商品多样化及出口目的地多样化,对提升亚洲抗拒外来冲击的能力十分重要。亚洲本身的市场规模巨大,收入水平也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此开拓亚洲自身的需求市场可谓首选,让亚洲在作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为“世界市场”,就可以将以中间品为中心的贸易扩张至最终品为中心的贸易,这不仅有助于亚洲的平衡增长,还能藉此减轻或摆脱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同

时,如前所述,为了防止经常账户失衡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我们也需要通过扩大内需等方式来降低风险。

从亚洲区域内部看,扩大内需的关键是亚洲对最终商品消费能力的培育和提 高。亚洲的人口规模巨大,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形成了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中间收入层。而根据 OECD 的预测,在未来的 20 年,亚洲的中等收入人群会翻番。但现实是与 EU、NAFTA 等其他区域相比,现阶段的亚洲对区域内的最终商品出口比率较低,其背后所折射的原因之一,是亚洲各国的收入差距和需求结构差异较大。近年来,亚洲在增长至上的开发战略下,在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各种扭曲,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增加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也存在市场成熟度的差异,以及内外制度上的障碍,比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和投资规则一体化的滞后。这些因素会提高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不仅影响区域内生产网络的进一步紧密化,也制约着区域整体的对外竞争力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活力,阻碍内需扩大的进程。

亚洲内需堪忧的原因还源自于亚洲各国经济的结构性障碍。亚洲各国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禀赋条件差异很大,特别是一些国家存在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难以消除,大量低素质劳动力无法直接参与价值链的中高端行业。结果是一部分中高端产业工资上升较快,同时因为低端产业生产率上升缓慢,而形成工资上涨的压力,使亚洲的低端行业失去国际竞争力,对非熟练工人有挤出效果,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而内需不旺。要实现扩大内需的增长模式,纠正这些差距,刺激中间层消费十分重要。这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地区间差距,形成包容性增长。

环境和资源也是亚洲现行增长模式的约束条件。在国际分工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亚洲作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然而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的产业结构也逐渐转向了资源消耗型。资源消耗增加的速度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这样对资源需求的急速增长,孕育出阻碍亚洲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两个制约条件。资源约束有多种形式,首先是资源匮乏的问题,如化石燃料和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亚洲农业人口多,农业集约化生产水平低,受到土地、水等资源的约束比其他地区更为严峻。其次,即使某种资源的储量丰富,但如果短期供应能力不能满足需求,该资源价格也会

中国发展与亚洲的未来

上升,从而增加发展的要素成本。这也是资源约束的另一种形式。实际上我们也能观察到,亚洲的能源既有总量短缺的问题,又有结构失衡的问题。这使得亚洲经济增长中的能源需求必须通过外部市场来加以平衡。然而,国际能源市场的金融投机,再加上严格限制使用高碳能源的政策不断推出,都增加了亚洲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使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大规模地流向具有能源、金融优势和新能源技术优势的国家以及非煤炭类的能源出口国。而关于环境约束,主要表现在对废弃物等的环境容量的不足及处理的功能性缺失,导致生态环境因负荷过重而持续恶化。最近亚洲一些城市频发的雾霾现象,更是凸显了这种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

诚然,尽快普及节能减排技术等低碳发展路线对保护环境十分重要,但这对大部分尚处在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的亚洲国家来说仍然是一种高成本经济,缺乏必要的投资和相应的收入水平来支撑对高成本清洁能源的消费。因此亚洲的低碳转型应该考虑到增长的边际成本,可以从改造现行能源供需体系着手,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逐步过渡到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不能靠一个国家单独应对,而是需要多方相互协作共同参与,不可分割。对于亚洲各国来说更是如此,合则共利,分则俱损。特别是要防止一些国家或地区为了要摆脱贫困,所以采取了为增长而增长所形成的对环境资源破坏的恶性循环。为此,亚洲各国政府应致力于低碳节能和新能源技术领域的多边合作,建立常态化的资源环境政策协调机制,共同促进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节能型制造业的发展。

相对经济紧密化和一体化的推进,亚洲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以及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制度层面的合作显得相对滞后。这主要是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原因。亚洲各国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转型程度和速度不一,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不仅妨碍了亚洲国际分工体系的进一步深化,也增加了亚洲各国之间的制度性的交易成本。换句话也可以说亚洲在制度创新上还有巨大的空间,制度创新的红利尚未得到有效发掘。近年来,亚洲一些国家之间的内部竞争和摩擦日益增强,提醒我们为了推进亚洲整体发展,维护亚洲和平、促进区域合作尤为迫切。亚洲国家非常有必要在贸易投资、经贸金融、民商事务、知识产权、环境资源、司法协作等主要领域加强法律合作,为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的经济一体化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而促进亚洲合作,需要亚洲各国在世界和亚洲秩序调整

中积极有效地管理矛盾和冲突,排除各种有可能加剧矛盾的干扰,尊重各国的重大利益,协调各国发展策略,为亚洲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

综上所述,亚洲要实现可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如何突破约束条件,摸索出一条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外需,同时致力于扩大内需的转型之路。亚洲各国的市场成熟度不同,制度的缺失等导致劳动力素质的两极分化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基于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深化也往往伴随着工资上涨的压力。因此一旦外需出现萎缩,则易陷入低端均衡被打破而高端均衡又暂时无法实现的困境。突破口应该放在如何实现亚洲实际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为达成这一目标,在内需不旺的现状下,对外依然需要与欧美发达国家共同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从制度上保障亚洲与其他地区之间国际分工体系的进一步深化;对内则要通过制度的完善、金融体系的一体化,提高自身的效率,提升出口竞争力,做到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通过效率驱动产业链分层次的高端递进,实现“工资深化”,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口红利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扩大产业规模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工资广化”,并通过推进城市化来培育内需市场。另外,从中长期看,随着亚洲人口的老齡化,劳动力减少的趋势将会越来越强,为此,还应致力于增加教育投资,培育创新型人力资本,为未来知识型、技术型产业转型做好必要的准备。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直接投资是形成亚洲域内分工和生产网络的直接推动力。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和提高亚洲生产网络的效率,在于是否能进一步促进区域内直接投资的活跃。这要求进一步改善亚洲的投资环境和商业环境,充实和改善硬件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培育高端的人力资源。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等制度层面的高度合作和及时跟进则是亚洲竞争力提升的制度保障。

上海论坛着眼于亚洲“未来十年的战略”,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专家和学者,围绕亚洲自贸区建设、亚洲货币、城市化、法律合作、能源与环境、企业创新、社会责任、税收治理等领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大家一致认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秩序和亚洲秩序的深入调整期,也是亚洲力量整体崛起的重要历史机遇期,继续积极应对危机仍然是当前亚洲发展面临的基本挑战。而面对挑战,需要各国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推进经济体制和货币体系改革,在能源等领域不断突破,探索属于亚洲的发展之路;也确认了未来10年亚洲发展的重大主题之一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大幅调整及地区经济关系重构。而

中国发展与亚洲的未来

为了更好地促进亚洲的发展,各个国家应根据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推动自身结构性转型,并合力推动亚洲的整体性发展转型。另外,国家之间还应加强合作,努力形成更加具有主导型和互补型的区域合作机制,并通过不断创新来促进新兴战略产业的培育和成长,重塑区域产业分工的格局。

本次论坛汇集的论文数量众多,覆盖领域全面,内容丰富,其中不乏体现作者智慧结晶的精辟之作。遗憾的是精彩论文太多,不能悉数收录,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仅从中精选出 16 篇,分为上下两册汇编成集,以飨读者。其中上册以“亚洲的发展:突破约束”为主题,选编了与东亚经济发展战略、单边多边贸易规则制定和选择,以及从产业链、货币体系的角度阐述亚洲一体化的相关论文,也收录了几篇论述亚洲如何在法律、环境、城市化和税收治理等方面合作的文章。下册则围绕“中国发展与亚洲的未来”的主题,选编了中国发展与东亚格局的演变、中国资本账户与经常账户开放、新型产业的发展等对亚洲经济的影响以及从能源安全、生态环境等角度论述中国发展与亚洲各国之间关系的论文。我们衷心希望这些论文能够对读者理解和思考亚洲未来的发展方向有所启发。

袁堂军

2013 年 3 月

目 录

Contents

- | | | |
|-----|---|------------------|
| 1 | 中国崛起与东亚格局的演变 | 周方银 |
| 15 | The Tiger Meets the Drag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Korea-China FTA | Yoon Heo |
| 46 |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对资本流动及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 | 何东、张丽玲、张文朗、胡东安 |
| 75 | Why Are the Stakes So High? Misconcep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China's Global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 | ZhongXiang Zhang |
| 110 | 生态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新审视 | 何爱国、杨义芹、宋奇 |
| 131 | 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及其与政治互动的回顾与启示 | 林金源 |
| 144 |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与亚洲的未来 | 柳卸林 |

中国崛起与东亚格局的演变

周方银^①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三十多年中,中国的实力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20 世纪 90 年代下半期,关于中国崛起的声音逐渐出现。在新世纪以后,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关于中国崛起的现实性、可能性,以及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冲击等问题,在学界与政策界的讨论变得更加热烈。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崛起引起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崛起。中国崛起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中国的崛起是在单极模式下的崛起。单极下特殊的实力分配结构给大国崛起造成了特殊困难,从而可能产生与历史上不同的大国崛起模式。(2) 中国是在大国无战争的时代进行崛起^②。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崛起国与霸权国很可能不再通过大国争霸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中国总体上试图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崛起。如何在和平的状态下,实现权力平稳的再分配或转移,

① 作者简介: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② 二战后,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国际体系进入了一种大国无战争的状态。

成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现象,并给中国的崛起带来了理论和现实挑战。

就东亚地区而言,中国的崛起也是在一个特殊的、从某种意义上对其不是十分有利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国的崛起一开始就面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综合实力优势和联盟体系(或等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崛起不仅要解决实力增长问题,还要解决在实力上升的过程中,如何与美国在东亚的等级体系对接,实现地区秩序的平稳转型的问题,以及如何在地区秩序中获得一个满意的定位,并在中国、美国及其他东亚国家的互动过程中,营造一个新的东亚地区秩序架构的问题。

二、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保持了整体上的和平。在相对和平的局面下,地区格局中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以及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贸联系和经济合作的显著加深。

当我们把 1991 年与 2011 年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时,可以发现在过去 20 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是惊人的。20 世纪 90 年代前,中国与东盟尚未建立正式关系,在当时的 6 个东盟成员国中,中国只与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建立了外交关系。进入 90 年代,中国加紧与其他东盟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 1990—1991 年间,中国先后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新加坡、文莱建立外交关系。此外,中国在 1989 年与 1991 年分别与蒙古、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于 1992 年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总体上说,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与不少东亚国家的关系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从 1991 年到 2011 年,东亚地区发生的最显著变化是经济关系的变化^①,安全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中国与本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迅速发展,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面貌在一个持续的时间段沿着一定方向发生着平稳和渐进的变化,这个渐进变化的累积性后果,极大地推动了地区格局的演变。由此形成

^① 本文所说的东亚国家包括地区内的中、日、韩、朝鲜、东盟 10 国和地区外的美国。但有时在讨论地区格局性质时,也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包括进来,因为中美与澳、印等国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对东亚格局的性质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图 1 中。

东亚地区经济格局与安全格局之间的张力。这一变化的结果,较为清晰地通过图 1 体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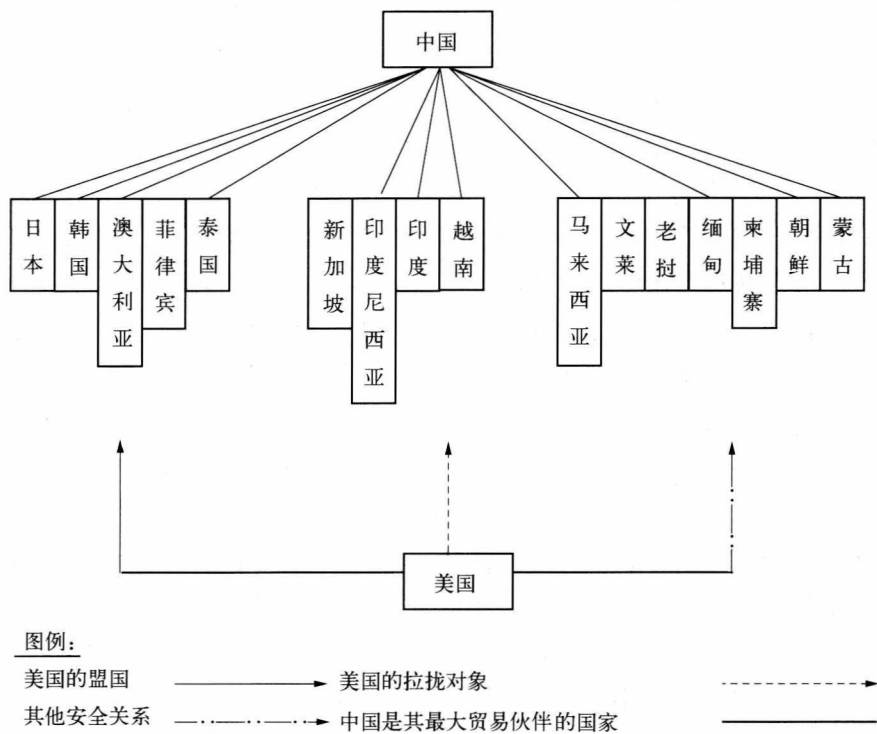


图 1 美国的安全网络与中国的经济优势

图 1 的数据主要来自 2011 年相关国家的政府统计,以及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网站。对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拉拢对象,美国政府并无统一的描述,但通过美国政府的做法及美国政府官员的文章、讲话和政府报告,可以感觉到其存在和大致范围。图 1 选择的这 4 个国家,只是一种大致的选择,不同的学者或许会采用不同的划分法^①,而且,美国的拉拢对象也是一个其范围处于变化中的概念。

如图 1 所示,美国在东亚地区有一个已经存在几十年的稳固的盟友体系,美

^① 例如,吴心伯认为,在奥巴马政府谋求发展伙伴关系的努力中,“印度、印尼、越南是 3 个重要对象”。由于美国与新加坡于 2005 年签订了战略框架协议并建立伙伴关系,双方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因此在这里我们把新加坡也列入美国伙伴的范围。参考吴心伯:《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2 期。关于美印战略框架协议,参见 http://www.mindef.gov.sg/imindef/news_and_events/nr/2005/jul/12jul05_nr/12jul05_fs.html。

国与本地区盟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试图进一步加强与盟国及与新加坡、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拉拢对象的联系,努力建构一个更加庞大和有效的网络,进一步强化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

同时,中国是本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 5 个正式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中,除菲律宾外最大的贸易伙伴都是中国^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中国作为本地区许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这一位置,中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关系之深、发展势头之快,也给人以颇为强烈的心理冲击。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国,澳大利亚 2011 年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 27.3%,而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 3.7%^②;中国在 2009 年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2011 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 3 629 亿美元,约为 2001 年 416.2 亿美元的 9 倍。同时,中国还是东盟最重要的投资和援助来源^③。1992 年中韩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为 50 亿美元,这一数额在 2011 年达到 2 206 亿美元,相比之下,2011 年韩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为 1 007.8 亿美元,不到中韩贸易额的一半。中国同时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④。2011 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从中国、美国的进口分别为 1 840.7 亿美元、743.7 亿美元,分别占日本进口总额的 21.5%、8.7%^⑤。

图 1 显示出东亚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许多国家在主要经济伙伴和主要安全关系上是相互分离的,这成为地区层面的一个普遍现象。这意味着东亚地

① 在判断一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时,有时有不同的计算标准,如果以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则东盟是泰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如果以单独的国家来计算,则中国是泰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② 见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网站: <http://www.dfat.gov.au/geo/fs/aust.pdf>。

③ 参考 http://www.asean-china-center.org/2012-07/14/c_131715506.htm, 以及 http://www.aseansec.org/stat/Table20_27.pdf。

④ 参见韩国外交通商部网站: http://www.mofat.go.kr/ENG/policy/bilateral/northamerica/index.jsp?menu=m_20_140_20、http://www.mofat.go.kr/ENG/policy/bilateral/asiapacific/index.jsp?menu=m_20_140_10, 以及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12。

⑤ 见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 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27876。

区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明显分离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不会是3—5年就能消失的短期过渡状态,而会在今后一个时期长期存在。它对地区秩序的含义表现为:在顶层关系上,随着中国实力上升,中美关系处于权力转移的过程中^①;在安全领域,美国及其在东亚的联盟体系依然稳定地处于主导地位;在经济领域,中国的经济中心地位有所加强,相互依赖关系加深;在观念分布上,本地区相当多的国家还未做好坦然接受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心理准备,地区的制度与规则还不能与中国正逐渐成为地区经济中心这一事实有效地接轨和相适应。

三、国家行为策略与东亚安全、经济二元格局的形成

东亚地区经济安全二元格局,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它的形成,既有地区先天格局方面的因素,也是主要行为体采取的特定行为策略相互作用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实行了一种被外界称为“韬光养晦”的崛起策略^②。这一策略的采取,加上中国的实力上升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美存在比较大的利益交集),使得一方面中国实力的上升并未对美国形成大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能为美国创造颇为可观的经济利益,这使美国难下决心对中国执行全面的和强度较高的遏制政策,而在总体上实行了一种“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③。中美的策略选择,影响了中国实力的发展方向(表现在中国发展过

① 我们需要对全球层面的权力转移和地区层面的权力转移进行区分。在全球层面,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还远未实质性地来临,但在东亚地区,权力转移可能会更快地发生。对中美权力转移的探讨可以参考 Steve Chan, *China, the U. S., 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Abingdon: Routledge, 2008)。

② 韬光养晦政策是邓小平提出来的,1992年4月28日邓小平同身边人员谈中国发展问题时指出:“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6页。

③ 关于中美策略互动的探讨可以参考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

程中对经济实力的极大偏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区格局的演化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周边许多国家采取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的政策,进一步推动了东亚地区经济、安全二元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1. 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及其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总体上执行了一种“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一个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服务。从策略上说,这个战略主要谋求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是谋求中国实力较为迅速的增长,另一方面则是试图在实力增长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在地区或全球范围引起不良反应,降低崛起过程中其他国家对中国制衡,避免中国崛起造成战略上自我包围的效果^①。这一策略试图在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降低对现有国际秩序冲击的情况下,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避免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减小发展的阻力。即力图在现有秩序不发生根本性变化或动摇的情况下,实现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

从实践上说,“韬光养晦”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1)在安全问题上忍耐,不试图挑战美国在全球及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对于在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安全问题和矛盾,总体上采取现实的、克制的、不激化矛盾的“搁置争议”政策。这一政策的执行,使得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实力的增长没有被外界视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实质威胁。它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缓和本地区安全局势的作用。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对美国在安全上的扩张和战略布局行为没有采取强硬的方式进行对抗,这在一定意义上便利了美国在安全领域低成本地维护、巩固和扩展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2)在经济领域,积极融入国际和地区经济体系,积极与东亚国家发展经济贸易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迅速提升。中国成为周边11个国家及东盟的最大

^① 参考 Michael D. Swaine,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and Publishing, 2000), p. 113; 金骏远:《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王军、林民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关于由于扩张政策而导致自我包围的逻辑,参见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